当艺术走进乡村，会发生什么化学反应？

□□ 汪欣

三农时评

近年来，艺术乡建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其主旨是以艺术介入乡村建设，使艺术成为提升乡村社会价值的手段。艺术不仅在改造乡村环境风貌、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能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还促进了乡村传统产业升级和乡村文旅产业的发展，也为乡村社会寻得了一条诗意发展之路。

乡村振兴战略的出台，使“乡村”成为当下中国的关键词。乡村建设的潮流方兴未艾，从中衍生出许多“乡村＋”的概念，如“乡村＋教育”“乡村＋环保”等。“乡村＋艺术”便是在这股乡建潮流中涌出的新概念。

艺术乡建是当前“乡村＋艺术”的重要表现形式，其主旨是以艺术介入乡村建设，使艺术成为提升乡村社会价值的手段。在近年逐渐兴起的艺术乡建实践中，艺术对于乡村社会的价值越来越引人关注。

以艺术改造乡村环境风貌成为乡村建设的风潮。设计师、建筑师、艺术家进入乡村，对村落环境进行艺术化改造，让乡村成为一种视觉符号，是艺术乡建的最初模式。乡土建筑是最能体现当地特色和历史传统的文化符号。对乡土建筑的修缮革新是用艺术改造乡村风貌的基础工程。一方面，修复老屋古宅、戏楼祠堂、牌楼街巷等村落民居与公共建筑，尽可能地恢复村落历史风貌；另一方面，通过建筑介入，引入新元素，营造新的艺术村落氛围。山西和顺县的许村，在艺术家的建议和规划下，除了修复了村落中的老宅祖屋，还将闲置废弃的老街旧宅改造成为许村艺术广场和许村国际艺术公社，作为创作中心、展示中心、艺术家工作室、艺术图书馆、新媒体中心以及艺术家乡村酒吧与餐馆。

艺术有助于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滞后是乡村文化落后的重要原因，也造成了当代农民文化生活和审美趣味的枯乏。艺术的介入为乡村社会带来了全新的文化体验。艺术乡建者除了恢复村落的传统习俗和文化活动，还为乡村带来了多样的文化形式。福建屏南县在漈下村首创“人人都是艺术家”公益项目，为村民提供油画教学，使油画创作成为该村的独特风景，村民创作的油画也成为该地的特色产品销往世界各地。让村民参与艺术创作实践，不仅让艺术更加“接地气”，也让村民贴近艺术，提高文化自信。

文化节庆活动是乡村社会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充满现代艺术气息的“乡村艺术节”，则是艺术家为乡村社会带来的一场现代文明洗礼。许村国际艺术节是山西和顺县艺术乡建的重要成果，两年一度的许村国际艺术节为当地引来了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使其成为国内外现代艺术的实践场，而村民也成为这场艺术盛宴的参与者。这场艺术实践不仅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国的乡村文明和现代艺术，也在中国文化与国际文化的交流碰撞中拓宽了本土艺术家及当地村民的视野。

艺术乡建推进了乡村公共艺术教育。教育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公共文化教育也是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家将艺术教育作为乡建内容之一，实现艺术的公共教育职能。他们通过艺术公共空间举办公益的艺术展览、演出；通过邀请艺术家入驻艺术基地，开展艺术助学活动，为当地村民尤其是孩子提供美术、音乐等艺术课程的义务教学服务。

艺术有助于促进乡村传统产业升级，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助力精准扶贫。我国乡村社会是以农业和传统手工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模式，传统农业经济的式微是乡村社会衰败的主要因素。随着艺术乡建的发展，艺术对于乡村经济发展的价值逐渐被发掘。浙江松阳县政府与建筑师合作复兴乡村传统产业，创造了当代乡村工坊——蔡宅豆腐工坊、横樟油茶工坊和兴村红糖工坊。豆腐、油茶和红糖制作都是当地的特色产业，但发展落后，建筑师结合当地自然环境和工艺特征，设计出融合了农产品加工、游客参观体验、村民活动、“活态博物馆”等多功能的现代乡村工坊。这种新型工坊，不仅为农产品提供了标准化作坊，还成为游客体验、村民交流的多元文化空间，提升了产业文化内涵。乡村传统产业的复兴为当地带来了经济效益，也吸引了更多的年轻人回乡创业，有助于缓解村落“空心化”的衰败景象。

艺术有助于促进乡村文旅产业的发展。文旅产业是当前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在传统村落旅游日益同质化的今天，艺术的介入为乡村旅游注入了活力。个性化的艺术村落景观、被赋予文化艺术内涵的特色产业、本土化设计的民宿等，都成为乡村旅游的亮点。为了促进文旅融合，一些乡村还举办大型艺术活动。2018年秋季，安徽铜陵文化和旅游局在犁桥村举办“铜陵田原艺术季”，旨在以导入艺术、设计和时尚文化的形式实现乡村振兴和文旅融合。活动为期两个月，有近百位艺术家参与，涵盖了美食、装置、雕塑、彩绘涂鸦、音乐、诗歌、舞蹈、先锋戏剧演出等多种艺术形式。这种融合了现代艺术气息和浓郁田园风情的艺术节，成为当地艺术助力乡村振兴和文旅融合的样板。

当艺术走进乡村，不仅使艺术在乡村找到了更广阔的实践空间，也为乡村社会寻得了一条诗意发展之路。

西部农村教育需要更多“燃灯者”

□□ 杨朝清

一年前，浙江杭州市滨江区三位初中老师报名支教，经过选拔考核，到海拔3000多米的青海德令哈一中任教，期限是一年半。本来再过半年，他们辛苦的支教生涯就要画上句号。然而，三人却主动申请再支教一年半。“因为当地很多家长都希望我们留下来，我们三个也舍不得走。”

笔者曾经在新疆某小学支教一年，对此深有感触。支教老师为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教育事业注入了“新鲜血液”，用自己的努力和付出赢得了学生和家长们的喜爱与肯定。“老师，别丢下我们”，既有孩子们对支教老师真挚情感的表达，也有孩子们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渴求。

在“理性选择”深入人心的当下，那些集聚着更多机会和资源的地方，更能吸引求职者。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导致东南沿海和发达地区比西部地区具有更强的人才吸引力，西部省会城市又比西部中小城市更有人才吸附力，西部城市又比西部乡镇更具有人才吸附力。与深圳、厦门等沿海地区拿出高薪招聘名校硕士毕业生担任中学教师相比，西部欠发达地区显然缺乏竞争的筹码。

千姿百态的社会流动，让教育生态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乡镇的想到县城，县城的想到市里，市里的想到省城或者沿海发达地区”，经过一层层“掐尖”，西部欠发达地区不少地方教师群体年龄老化、结构单一、人员短缺，教育观念和教育方法也缺乏“时代感”，缺乏创新与激情。支教教师的到来，为西部欠发达地区注入了“源头活水”，让学校教育更有生机与活力。

爱尔兰诗人叶芝认为，“教育不是注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与东南沿海相比，西部欠发达地区缺乏优质的教育资源，孩子们没有丰富多彩的课外生活，博物馆等公共产品也相对匮乏；尽管如此，当地的孩子们同样有“知识改变命运”的希冀，他们同样有向上社会流动的渴望；支教老师犹如一个“燃灯者”，给孩子们点燃希望的火把，有助于照亮孩子们前进的道路。

在肯定支教老师作用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和漠视当地许多老师的付出和努力；没有这些老师的尽心尽力和价值坚守，西部地区的教育生态将会更加脆弱。作为一种“输血”的手段，支教教师为西部地区的教育带来了不少的改变；只不过，支教教师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优质教育资源失衡的问题，需要诸如公费师范生政策等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需要建立强大的实施操作系统，确保优质师资“下得去，用得好，留得住”。

读懂“老师，别丢下我们”的呼唤与期盼，需要在均衡教育资源、丰富教育内核、缩小地域和城乡差距上多下功夫。当“燃灯者”越来越多，整个社会的流动图景才会更加美好。

别让“网红食品”沦为“网坑食品”

□□ 贺成

近日，南昌大学设计院第一设计所的多名员工因食用江西卡拉多食品公司制售的网红“爆浆松松”面包后出现高烧、腹泻等疑似食物中毒现象。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日前公布了最新调查进展：已送医50例，责令涉事门店停业。

实际上，这不是网红食品第一次“出事”了。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食品类投诉9118件，数量同比上涨25.8%。其中，在热点类投诉中，网红食品问题频频被曝光。从司法审判来看，以北京互联网法院为例，截至今年6月21日，在该院受理的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件和互联网购物产品责任纠纷案件两类案由中，涉网售食品类案件占比高达73%。

网红食品频频出事背后，是具体社会个体合法权益、身体健康遭受伤害，还暴露出很多人过度“迷信”网络意见领袖的消费心理。比如，今年5月，上海的董女士在某网络平台上看到一位大妈拿着烤虾做推广的视频，称“自家烤的虾干，保质保量”，便下单购买，但收到虾干才发现是“三无”产品。

可以说，一些想要提高销售量的商家和带货心切的主播网红，正是利用了一些消费者的“迷信”心理，在宣传产品过程中添油加醋，偏离了商品本身的质量属性和正常用途。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违法添加非食品原料的“三无”产品摇身一变成“爆款”食品，而所谓的“代购”进口食品，可能只是一个虚假包装……

但是，要避免“网红食品”沦为“网坑食品”，不能居高临下提醒一番就完事儿了，或者索性让消费者独自去战斗。

一方面，与传统销售渠道不同的是，一些“三无”产品通过微信朋友圈渠道销售，也包括微商在内的社交电商销售渠道，不但避开了市场监管环节，而且给受害人维权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让消费者跟商家单打独斗，很可能无法顺利争取合法权益。同时，这也暴露出监管还存在“死角”，完善监管执行责无旁贷。

另一方面，在“网红食品”频频出事背后，还存在着许多经营者法律意识淡薄的问题。比如，有经营者认为自己是代购就可以不需要经营许可、产品可以没有中文标签、无需说明产品来源，甚至有一些人打着C2C（个人对个人电子商务）业务的幌子进行直邮，将不符合我国规定的食品带到境内来售卖。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经营者法律意识淡薄是普法和执法力度不足造成的，谁该“补课”不言而喻。

只有职能监管部门高度重视，在强化责任担当中发挥主导作用，加强对消费者的宣传引导，加强对利用电商平台、社交媒体、电视购物栏目等渠道实施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重拳出击，倒逼平台对于此类行业乱象进行整治、建立相关审核制度和体系、进一步完善相关管理机制，等等，“网红食品”才不会沦为“网坑食品”。

为基层“减负”不能各唱各调

□□ 江文

有基层干部反映，由于一些单位和部门行政化倾向严重，前几年一度减少的奇葩证明，今年又有回潮的迹象。

为基层减负，可谓牵一发动全身，既需横向职能部门之间统筹联动，也需纵向上下级部门之间协调联动，只有秉持这样的“一盘棋”思维，基层减负才可能取得实效。如果一些单位减了，另一些单位却墨守成规，没有减，这就可能让已经减负的单位遭遇各种各样的阻力，甚至可能因此葬送减负成果。

比如某地出台规定，基层只需盖居住证明、死亡证明等8种证明。如果这一规定落到实处，这无疑能大大减轻基层负担，让基层干部可以甩开膀子深入群众，开展面对面服务群众的工作。可是现实并非如此，据当地干部反映，要盖的章时至今日仍然是一个也没少。

究其原因，是因为一些单位，只从本单位的利益出发，各唱各的调，各自为政。比如按照规定，小区里民用房改商用房是政策不允许的，工商部门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不给登记。但工商部门却不直接拒绝，而是把矛盾转移到基层社区头上，让有相关需要的人先去基层社区登记盖章。这样的推责，让基层社区左右为难，盖章违反政策，不盖章，办事群众觉得是社区干部在刁难他们，不依不饶讨说法，这给基层社区干部增加了不少的负担。

为基层减负，需要每个部门严格落实政策规定，不打折扣地执行，如果各唱各的调，各自为政，就会变成“你减你的负、我压我的担”，部门之间不联动，导致基层执行减负沦为“面子工程”，最后让减负成了“空头支票”。希望各地在为基层减负的时候，一定要有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担当思想，从而保证基层减负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绘图：刘军

据媒体近日报道，在燃气管道建设滞后的地区，农民大都使用液化气瓶作为盛装工具。多地走访发现，部分气站人员骑着电动三轮车，载着几个1米多高的气瓶采用“嘴对嘴”的形式为村民上门充气。部分乡镇干部称，虽然知道“黑煤气”不安全，但其能方便村民生活，在监管不严格时大范围存在。受访基层干部认为，部分地区办理使用登记时均是采用象征性的电子表格或纸质登记，未建立统一的气瓶数据库，气瓶“黑户”较多。

这正是：

黑煤气灌黑户瓶，安全隐患易现形。
创新制度严监管，生命财产得安宁。

文 @十八刀

更多三农评论，敬请关注农民日报社评论部微信公众号：**重农评**。

从效率到公平：跨越贫穷本质的政策选择

□□ 郭芸芸

新农言

今年诺奖将经济学奖颁给了发展经济学领域的三位学者，也将贫困问题再次带到世人眼前。《贫穷的本质》作者正是今年的获奖者阿比吉特·班纳吉和艾斯特·迪弗洛。他们连续15年对全球贫困问题进行追踪，通过随机控制实验观察后著成此书。书中矫正了一个命题，传统经济学认为穷人之所以无法迈出贫困陷阱的原因在于无法从外部获得更多支持，然而在实践中人们发现政府的补贴有时候往往是无效的，作者通过田野实验与跨学科分析，对影响贫穷的因素进行归纳，提出结论：穷人无法摆脱贫困的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身处多重困境而失去选择自由与耐心、金融服务不健全、教育中存在刻板印象威胁。其结论既是对主流扶贫做法的反思，也对发展中国家解决贫困问题有借鉴意义。

中国既是发展中国家，也是人口大国，长期城乡二元发展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较多。随着脱贫攻坚的推进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截至2018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减至1660万人，为世界减贫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2020年脱贫攻坚即将进入收官之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即将实现，届时城乡收入差距将逐步缩小，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中的生活富裕将成为更重要的指向。在这样的时间节点上，同时我国经济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后续脱贫机制应该重视什么，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的真正需求是什么，这本书给了我们一些启示。

虽然关于研究方法和研究者多有争论，但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人道主义情怀的鼓励是公认的事实。长久以来，很多具有人道主义情怀的经济学者与专注福利与贫困的经济学家给我们累积了珍贵的、解决贫困问题和收入差距的研究成果，成为人类文化的宝贵财产。今年的诺奖获得者的研究成果虽然在部分问题上缺乏全面视角，如在提到教育的现金转移支付问题时并没有提到其反效果，即迎合利己主义的激励可能削弱内在激励、互利互惠和其他公民的显著动机。但是其宝贵之处在于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围绕贫穷这一议题所有人应对环境的选择与心理动机，关注人性的变化，也是本书重要的出发点。基于人性的考量，可以成为制度设计的新角度，这样的角度正是落实兼顾公平原则的逻辑起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高速但非均衡地长时间发展，相伴而来的是公共政策选择的问题。市场化进程的改革推动我国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均收入实现较快增长，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从无到有，制度是这些重大成就的保障。但市场化改革是以效率为优先的，其结果是强化机会与收入的不平等分配。以教育为例，书中认为对于穷人来说，教育投资的本质仍然是有条件的现金转移，对于穷人来说相对吃力的投资部分，需要政策的干预。政府的干预会带来改善，而长效机制的建立仍需要公平的政策支持。书中对18个国家的调查显示，至少有9个国家即使极为贫穷，家庭子女入学率也在80%，印度95%的儿童可以在距离家不到半英里的学校上学。从全球发展中国家来看，教育普及率已大幅提升，教育质量的提升则更加紧迫。如何提升教育的质量，书中作了有益探索，提出生活的稳定感是家长具备长远眼光的基础，而避免教师的精英偏好传导为刻板印象威胁，进而建立公平输出教育资源的学校体系，是一种基于公平的公共政策的选择。长久以来，我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和教育制度，从全面扫盲到优先发展教育，教育改革成就显著，文盲率明显降低，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80%减少到青壮年全面扫盲，教育的跨越式发展为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本，充足的就业岗位和基础教育的普及也为人们脱离贫困提供了条件。但如何保障教育资源的均衡分配，需要作出更多尝试。

实际上，随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出，我们的政策逐渐向关注分配与再分配环节的公平原则倾斜。党的十九大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新判断：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分为了三个维度，即物质生活需求、社会生活需求和精神生活需求。公平是一种协调方式，如果不能解决效率主导带来的发展机会不平等和财富收入不平等的问题，将会制约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因此更多地兼顾公平，可以从两个维度帮助我国脱离贫困陷阱。一个维度是对贫困人口来说，有些影响贫困的因素是可以短期内通过补贴明显改善的。但有些需要通过政策选择来长期改善的，尤其是在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领域，如前文对教育部分的探讨一样，需要对不同的主体进行多层次调整。另一个维度是对脱贫人口而言，其社会网络结构从效率主导转变为情感主导，满足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公共政策需求成为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高级形式。要跨越贫困陷阱，公共政策要越来越多地向兼顾公平倾斜。

如果把国家比喻成人，在经历了由外而内的发展之后，由内而外的探索更为重要，也是通往美好生活的重要路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现阶段更多地兼顾公平，协调各方力量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是促成社会积极进步的更好的公共政策选择。

基层女干部要用好“柔”与“刚”

□□ 陈杏

下乡调研时，偶遇曾一同备考的“战友”，短短几年，她褪去了学生时代的青涩害羞，取而代之的是沉稳干练。作为老同学的我不禁调侃，为啥在基层几年，你由一个“弱女子”变得这么“刚”？她打趣道：“工作干得好，百姓过得好，基层干部还分啥男女。”虽是句俏皮话，却足够引人深思，曾经，职场女性身上总会被贴上“柔弱”的标签，这一认知在人们的潜意识中根深蒂固。殊不知，“柔”与“刚”本就不是某一性别的专属特性。“柔”并不一定等同于弱，亦可以是由心底而生的为民情怀；“刚”也并不只意味着外在强势，亦可以是坚如磐石的忠诚信仰。只要能够不改本色、不违初心、坚定前行，每位基层女干部身上的“柔”与“刚”都值得尊重与学习。

初入基层的女干部大都听过这样的声音：“整档案、做表格，这活最适合小姑娘”，“给你分派了个好村，村情稳定，工作也好做”，“这次朗诵比赛人选你最合适，可得把握机会”。这些声音有善意提醒的因素，但同时也有“刻板效应”，似乎对基层女干部而言，负责所谓的轻活、易活或是充当表演者、主持人等“门面担当”已经成为了一种“惯例”。诚然，这其中有出于对女干部照顾的考虑，也有把工作要求和女性特质结合的必要性，但从干部培养的长远角度来看，这种“特殊关照”并非一定是最佳选择，在实际工作中，个别女干部由于长期处于相对安逸、缺乏挑战的工作环境中，逐渐产生了“示弱”心态，甚至片面地认为那些“攻坚克难”的任务理应由男性承担，遇到具有挑战性的任务便只想躲避绕道，最终能力和心态都渐趋平庸。

而反观那些无谓性别标签、兼具柔情与热血的女干部，凭借一颗忠心、一腔赤诚、一身肝胆，奔走在基层一线，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不遗余力地发光发热，为国家、为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广西百坭村第一书记黄文秀，将自己30岁的生命定格在了扶贫路上。一年零82天，帮助全村417人脱贫，将贫困发生率从22.88%降到2.71%的脱贫“成绩单”上书写着黄文秀的“刚”；为促脱贫，她先后往一家贫困户跑了12次，帮他申请扶贫贴息贷款种植了20亩油茶树，最终在2018年顺利实现脱贫。“她一心一意帮我，像我女儿一样”，村民的这般评价，映照着她细致贴心的“柔”。

基层干部是做好基层工作的骨干力量，而女性干部作为基层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和国家事业中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抛却性别偏见，每个年轻干部身上都具备多种潜力，既有家国情怀、心忧百姓的“柔”，亦有义无反顾、奋不顾身的“刚”，刚柔并济、内外兼修，让年轻干部能够在基层找到理想的“着陆点”，找到实现自我价值的“发力点”，才是更好为基层储能蓄势、实现长远发展的良方。作为基层单位，应给予基层男女干部同等程度的磨炼与摔打、机遇与挑战，让“性别差异”在基层既不是“特权”也不是“惯例”。而基层女性干部自身也要走出性别认知的“桎梏”，不妄自菲薄、不自我设限，不管身处何职、身居何位，有一分光，便发一分热，为推动基层事业的发展贡献强大的“她力量”。